

吕叔湘先生与青年一代

张伯江

吕叔湘先生关心青年这个话题也许是说不完的,因为当今活跃在语言学界各个年龄段的学者,大概都在年轻的时候得到过吕先生的关怀和教诲。我这里所谈的,是最后一代受到吕先生直接关怀的年轻人的故事。

八十年代中期,吕先生卸去了所有行政职务,也不再亲自带学生了。八十高龄的吕先生虽然不再做具体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仍然很多。除了他必须参加的各种活动外,每天找他看稿的、求写序、求题字的以及讨教各种语文问题的也使他应接不暇。那时我做他的秘书,帮他处理一些读者来信和来访。他对我说:“老朋友老相识有事来求,虽然说是盛情难却,我也是能推就推;但青年同志来讨论问题的,我很乐意回复。”于是,凡是青年人来信向他求教,不管大问题还是小问题,他总是尽可能地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有些问题对一般青年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就把那些回信整理出来发表在杂志上。大家现在在《吕叔湘文集》中看到的《给一位青年同志的信》、《漫谈语法研究》、《关于语法图解的用途及其局限性》、《关于做诗的一封信》等就是这样形成的。二十年来,这些文章不知启发了多少青年语言教学与研究工作者的成长。

对吕先生这份热心最有切身感受的就要说是语言所的一批青年了。那几年语言所每年都有一批新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分来工作,吕先生对这些年轻人格外关注。过去,他每有新书出版,总要分送给他的老朋友、老同事。1989年他的《吕叔湘自选集》出版以后他对我说:“这次我不送老人了,专送所里的年轻人。因为这里选的文章对青年人学习怎么做语言研究有帮助。”青年同志们拿到了吕先生亲笔题字的这本书都非常感动。还有一次,吕先生见到中华书局新出了一本《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他觉得那里的文章对于帮助青年们阅读古书、尤其是解决疑难问题很有好处,就递给我几块钱,让我到书店帮他买来几本,然后分送给所里几个年轻人,嘱咐大家读古书时要注意辨别那些细微的地方。那时候吕先生只要有事到所里,总要点名当面询问这个青年那个青年现在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有一回在他家里他问我:“新来的年轻同志是不是都很好学呀?”我说是。他说:“我让他们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他们都不来,是不是怕我忙不好意思来呀?我就交给你一个任务吧,从今以后每星期由你安排两个年轻人到我这儿来我跟他们谈谈,一次来一个也行来两个也行。”后来,我就找了《中国语文》和现代汉语室的几个年轻人先后去吕先生家谈话。1988年我负责所团支部工作的时候,在党委的支持下准备在所里组织一个青年学术沙龙。我把这个想法跟吕先生说了,他听了非常高兴,说他一定要参加青年们的这个活动。沙龙的第一次活动我就请吕先生来跟大家见面,吕先生为此做了悉心的准备。他从报刊上复印了两篇跟语言文字有关的文章给大家讨论。大家发表意见后,吕先生讲了他的看法,重点讲了怎么看待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告诉大家面对这样的问题该怎么思考、怎么分析。那以后我们顾及他的身体没有再请他参加沙龙的活动,他却不止一次主动说要

到沙龙去跟大家讨论问题。我记忆中至少有这么两次：一次是所里一位青年写了一篇语法论文请他看，他看后觉得有必要跟其他青年一起讲评、讨论该文反映出的选题角度、参阅文献等问题；还有一次是他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篇谈语言与文化问题的文章，他认为文中概念十分混乱，应该以此为例外跟青年们讲讲相关的问题。1989年的“五·四”青年节，所科研处和团支部联合举办了首次“青年学术演讲会”，85岁高龄的吕先生带着极大的热情坐在台下来听青年们的报告，并参加讨论。他不仅鼓励青年们读书学习，更注意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提高。那时《中国语文》编辑部送他审稿子他都忙得看不过来，却还经常要求拿些年轻编辑的审稿意见来看，看看他们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1988年大家谈到《中国语文天地》怎么办出新意的时候，吕先生提出让几个青年同志合写一部深入浅出的《语言漫话》连载，并亲自拟好了提纲发给大家。虽然这个计划由于后来杂志的停刊而未能施行，但大家还是从吕先生的谈话里领悟到了很多东西。

我本人是1984年开始作吕先生的秘书的。那时候我每星期去吕先生家两次，吕先生知道我喜欢语法研究，开始却很少跟我谈及语法，他常问我的是“喜欢读什么古书哇？”“一天多少时间读英语啊？”这样的问题。我第二次正式到他家去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本《吕叔湘语论文集》，并跟我说：“你帮着我做事，我也应该在学习上帮着你。你语法上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说，写了文章拿给我看，可是古书和英语一定要读扎实。”吕先生看我自学不得要领，就亲自给我选定了读物，有历代的笔记小说，有英美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一本《涑水记闻》，一本 Understanding Grammar，吕先生是一段一段指导我精读的。每次去见吕先生前，吕先生都让我准备出一些问题问他，我不好意思，吕先生说：“你还怕我笑话你吗？”于是我就记下读书中的问题请吕先生一一给我讲解。里边好多细节我终身难忘。

我工作后不久，想考个研究生深造一下，吕先生知道了以后，表示非常理解，但又考虑到编辑部的工作，就建议我考个在职的研究生。于是我一边跟着徐枢先生学习，一边听吕先生的指点，学业上提高很快。一年以后英语期末考试的时候，吕先生看我们的教材偏难，很为我着急，他主动提出来要帮我复习，还说为了不让别的事妨碍，他要利用中午时间来给我讲练习。我们都知道吕先生有午睡的习惯，大家有什么事都从来不在中午去打搅他，我当然也不敢答应，可吕先生却很坚持，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酷热的六月里，连着几个下午，从一点到四点，吕先生逐一批改我做的练习，我满纸的笨拙、无知和困惑都叫吕先生那古朴而又帅气的红色笔迹一一化解。“你怎么一个句子里能有两个动词呀？”至今我翻译英文句子时脑子里总是想起吕先生这句话来。

吕先生跟我谈论最多的自然是语法方面的话题了，有两个细节深深影响了我后来的方向。一次是1985年的时候有个在北大学习的东德留学生给他写信请教形容词重叠式的问题，吕先生跟我说：“外国学者常常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从五十年代到现在，我已经看到好几个外国人做了这个文章。因为他们的语言里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感兴趣。其实这个题目没有太大的意思，它只是这种现象本身而已，没有普遍意义。语言研究虽然往往讲的是个别现象，但规律都是能旁及他类的。”另一次是几天以后，我们谈起口语里省略介词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的语言研究，是把书面语、口语、各种文体、各种风格等等都一锅烩，总结出几条规律，实际上得出的是个最大公约数。要是把各种条件摆出来分别的看呢，是各有不同的规律的。可惜这个工作没有人做。”他尤其指出北京口语应该好好研究。所以，到1993年我和方梅准备从功能角度研究北京口语的时候，吕先生非常高兴地在我们的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的推荐书上写了推荐意见。

凡是跟吕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为他良好的学风所感染。我很少听到他讲什么大道理,好多细小的地方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有一回我帮吕先生抄好一篇稿子请他看,我知道吕先生一向认真,抄的时候一笔一画都不敢出错,可是没想到吕先生看的时候还是一边看一边改,他用蓝水笔重重的把我稿上每一处逗号的撇和句号的圆圈都描清楚。看我有些不解,吕先生说:“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吧。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头一次给叶老主办的《中学生》杂志写稿子,有一天我到 he 那里去玩,看见叶老正在审我那篇稿子,他一个一个地给我描标点。我说:‘你干嘛这么认真呢’叶老说:‘你写的时候图省事,校对的时候就要麻烦了。’从那以后,我每回写文章,都要把标点点清楚了。”听完以后我惭愧地把稿子要回来,自己慢慢描起来。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跟在吕先生身边工作这些年,不仅学习了他的学识,更多的是学到了他的作风。

(张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

张志公先生学术追思会在北京召开

为了表达对张志公先生的缅怀之情,学习他的道德文章,纪念他在语言学界、语文教育界等方面的业绩,在张志公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市语言学会、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5月30日在北京市社科联联合召开了“张志公先生学术追思会”。出席追思会的有北京市语言学界、语文教育界的专家、学者40余人,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也到会缅怀志公先生的情谊,并作专题发言。

会议由北京市语言学会秘书长奚博先生主持。他首先代表社会各界对张志公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请与会同志起立致哀。接着,北京市语言学会会长胡明扬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刘道义女士分别向大会致辞。胡明扬先生说,张志公先生是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创始人,北京市语言学会能够成立、发展至现在,应归功于先生的倡导、领导和组织。他说,50年代以来,张先生在语言研究、语文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今天我们聚会在这里,就是想通过学术活动,追念先生的学术业绩,表达我们的悼念之情。

许嘉璐先生在发言中,对张志公先生的主要学术业绩作了概括。他说:“我以为,贯穿在志公先生一生学术研究里程中的主线,简言之就是:学术研究要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语文教学要讲究有用,语法体系要从汉语的实际出发,解决汉语语法的分析、解释、应用问题,语法研究要追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

在追思会上发言的有饶长溶、张炼强、王宁、顾德希、陆俭明等14位先生。他们在表达对张志公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缅怀之情的同时,分别从各个方面颂扬张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指出张先生在汉语语法、语汇、修辞、汉语辞章学、语文教学、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等诸多领域所作的研究和所取得的成就。

北京市语言学会常务副会长陈建民先生作了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张志公先生“杂而且专”的治学风格。他说:我们北京市语言学会应该继承我国几千年来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沿着志公先生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应用的研究道路,有所前进,有所提高,有所创新。

(王本华)